

非去不可

为了进军世界杯

曾是梦想 仍是梦想
漫长等待
痛苦煎熬
世纪末临门一脚的
中国足球

马德兴 编著

工商出版社

非去不可

——为了进军世界杯

马德兴 编著

工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宏民

封面设计 董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去不可——为了进军世界杯/马德兴编著. —北京:工商出版社,1997·4 ISBN 7—80012—273—5

I. 非…… II. 马… III. 足球运动—运动成绩—预测—中国 IV. G84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215 号

非去不可——为了进军世界杯

马德兴编著

出版·发行/工商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376 千字

版本/1997 年 6 月 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社址/北京丰台区花乡纪家庙

电话/63812074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7—80012—273—5/G·31

定价:26 元

引 言

曾是梦想,仍是梦想。

漫长等待,痛苦煎熬。

谁能预测,世纪末的中国足球能否冲出亚洲?谁又能告知,世界杯的梦想是否还要到下个世纪圆?

毫无疑问,那令人魂牵梦系的世界杯,将是中国足球永远不舍的追求,是我们非去不可的圣殿。然而,中国足球又总是在凄凉悲壮和呓语梦想的怪圈里迷茫与徘徊,中国球迷也只能在苦涩泪水和无名愤怒中痛苦地等待。回首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十七年,百位将士轮番上阵浴血奋战却屡战屡败,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刻骨铭心。

我们归罪过动荡岁月的荒废,咒骂过阿拉伯兄弟的“慷慨”,也埋怨过运气甚至裁判的不公,但是,那每每令中国队折戟而归或追悔莫及的“屠龙杀手”的档次低至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却是国人不争的事实。

我们试过简捷的英式长传冲吊,练过稳固

的意式密集防守；我们也苛求过灵巧的巴西式短传渗透技巧，膜拜过硬朗的德式整体攻防战略。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时至今日中国足球仍然什么也不是，依旧没有任何鲜明的特点。

我们偶尔也怀恋过苏永舜麾下的两翼齐飞，或羡慕非洲雄师瞬息间的突然崛起，但我们所能看到的还是那个每每壮志未酬、功亏一篑、不方不圆的“中国式足球”。

一九九七年，无论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还是法国世界杯外围赛都已燃起战火。我们不能容忍令人难以启齿的历史再次重演，不能再步入国人无法承受的厄运怪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足球，客观评价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现状和未来，必须找到阻碍中国足球进一步发展的症结和解决办法，必须进一步探讨适合中国足球的特有模式和发展方向。

本书将分七个章节，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足球和职业联赛，披露中国足球内幕和历史，剖析国内外职业俱乐部的模式，预测法国世界杯外围赛，展望九七后的中国足球，诸多足球资深专业人士和普通球迷关心的问题，将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第一章

几经坎坷历经磨难职业联赛成规模全赖社会参与各界支持,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中国足球难两全可谓成绩斐然问题不少。阴沟翻船,浅滩折戟,足球界早已无人再敢信誓旦旦。

眼见冲出亚洲渺茫,中国足球终趋实际,职业联赛既是共识也是无奈。腰包渐胀的企业家亦不再满足于荧屏前的煎熬和叹息,商业诱惑导致了更直接的参与。体育搭台经济唱戏,足球无疑是最佳的戏台。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甲A和甲B……

怎奈期望和水平相距甚远,投入与产出参差不齐,现实与需求难趋平衡。“婚变”和教头被“炒”等诸多事件层出不穷又成为中国职业足球的新热点。个中缘由皆事出有因,是非功过亦自有评说。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阿基米德(古希腊数学家)

中国的每一名球迷几乎天天都在发出类似的豪言壮语：“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中国的足球！”

自70年代全面重返国际足坛以来，以世界杯为坐标、四年一个轮回，中国足球在过去的近20年里，对这个支点的寻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我们曾把国家队看作是这个支点。国家队从封闭长年集训到海外留学，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从由各地方球队抽调精英到以一支地方队为主，从一支国家队到“红黄”双轨制。但中国足球依然连世界杯的门槛都没有跨过去……

我们曾把教练看作是这个支点，认为教练水平不行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根本因素。于是，中国队的教练员一茬换了又一茬，从年维泗到苏永舜、到曾雪麟，再从年维泗到高丰文、到徐根宝；从本国教练到洋教练施拉普纳、到拉德，再到本国教练戚务生。然而，中国足球仍然在低谷中徘徊……

我们曾把心理素质看作是这个支点。从1985年“5·19”到1989年新加坡的两个“黑色三分钟”，到1992年1月吉隆坡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到“施大爷”的“豹子精神”，到1996年3月吉隆坡的“都打到这个份了，谁怕谁”，再到“与其窝囊地活，不如悲壮地死”。十多年了，我们见了韩国人还是要哆嗦……

我们曾把战术看成是这个支点。从苏永舜的“两翼齐飞”到曾雪麟的“小、快、灵”，到年维泗、高丰文的防守反击，到徐根宝的“高举高打”，到施拉普纳的“四不象”，再到戚务生的防守反击，直至现

在的“压迫式”。可除了高丰文有过唯一的一次成功记录外，失败无一幸免……

我们曾……

1994年，当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的职业联赛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时，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国脚们东渡扶桑，破天荒地摘取了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枚亚运会银牌；此前，德国斯图加特队、意大利桑普多利亚队及AC米兰队又相继栽倒在中国国家队和北京国安队的脚下……中国的足球历经磨难之后，如同久旱逢甘霖，似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职业联赛。于是，中国足球的春天似乎即将到来。

正当中国足球喜气洋洋跃入1995年时，迎面而来的，却是抹不尽的忧愁：1994年中国“足球先生”黎兵在转会制一出台，便首先出来闹转会；接着，迈特足球队全体队员罢训，抗议俱乐部当初允诺的工资、奖金等条件不兑现；辽宁足球队20名队员集体签名，宣布退出远东足球俱乐部……随即，在职业联赛第二个年头开始后，各种裁判风波、教练被“炒”风波、运动员夜不归宿事件、球场打架事件、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泡沫足球”一词的出现，等等，各类事件、各种说法层出不穷。

然而，商业比赛的走红、欧美一支支“劲旅”屡屡访华受挫，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工体不败”神话，球市的火爆……所有这一切的辉煌掩盖了诸多问题。至1996年，当我们满以为“质”的飞跃就在眼前，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亚洲诸强厮杀时，国奥队0比3惨败给韩国国奥队、国家队0比1“悲壮”地负于日本队，韩国队主力后卫金判根在中韩对抗赛后一句“交手之前听说对方水平提高了不少，谁知一交手后对方又是溃不成军”，中国的球迷又一次沉默了……

也许，中国足球场的沉垢太多，人们太希望“职业化”能迅速促使中国足球旧貌换新颜了……然而，我们或许是太天真了，中国足球的头绪太多，职业化不是万能药，不能包治百病，更不可能令中

国足球产生如火箭升空般的质的飞跃……

当我们面对 1997 年的中国足球,面对本世纪末的最后一次冲击,面对法兰西的召唤,我们似乎有些茫然了:为什么寻找中国足球的“支点”那么难?

中国足球,你难道真的就没有“支点”?

第一节 足球是方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坚信“足球是圆的”。的确,足球是“圆”的,但“圆”只是其外表的特性,其实质、其内涵并不是“圆”的,而是“方”的,有其内在的特性,是有规律可循的。

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足球是圆的”,“圆”到连中国足球都没有了“支点”,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过去的失误。中国足球的“支点”就在眼前,只是我们始终没有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去寻找这个“支点”,也不愿意面对这个“支点”。

一、中国足球需要“扬弃”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每一次国家队大赛失利,总是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舆论界、球迷是这么说,从教练员到运动员也是这么说。于是,每一任新教练上任之后,首先不是去认真总结上一任教练的成败得失,虚心与前任沟通,采取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而是“一刀切”。所以,纵观这些年来中国队的失败,在很多方面是那么地相似。我们常说,聪明的人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中国人并不笨,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在足球场上犯同样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又何止两次?

我们经常说中国足球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或者要走自己的路,但是,40 年了我们的风格在哪?我们的路又在何方?

当年,苏永舜教练指挥的国家队以“两翼齐飞”而著称,我们把

它称为中国足球的风格；曾雪麟“小、快、灵”给人以清新的感觉，我们又把它称为中国足球的风格；当年维泗、高丰文高举“防守反击”大旗时，我们又把它称为中国足球的风格……

事实上，任何一支足球队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又都有其延续性，苏永舜所带的那支国家队与他的前任年维泗所带的国家队没有实质性差别，队员也基本没变，只是苏永舜进一步让队员各自的特点发挥出来了而已。包括曾雪麟带队的指导思想也十分讲究队员的技术。

中国足球之所以没有把这种风格延续下来，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风格，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坚持我们过去成功的东西，例如讲究技术、注意中场组合、两翼齐飞等等。

记得年维泗同志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搞了40年的足球，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之所以没有坚持下来，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没有认真总结40年的成败经验、教训。所以，如果我们把过去40年中成功的经验综合起来，或许那就是中国足球的风格了。每一位教练都应认真总结前任的成功之处，吸取其失败的教训，把这些成功之处在自己的球队中体现出来，针对过去失败的原因拿出解决办法来。一句话，中国足球需要承前启后。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能有鲜明的风格。

由于失败的太多，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不行，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亚洲一流足球队了，已经沦落为亚洲二流甚至三流球队。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充分看到自己的长处，没有正确估价自己的实力，一输球就全盘否定自己。新的比赛来临就患得患失，缺乏击败对手的自信心。所谓的“恐韩症”就是典型的例子。“恐韩症”与当年怕朝鲜队是一样的。1981年参加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当我们打败香港与朝鲜争小组出线权时，赛前许多人认为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理由是我们争不过朝鲜。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现在的“恐韩症”难道就不能打破吗？在1988年亚洲

杯赛上,中国队与韩国队苦战 120 分钟,中国队没有一名队员抽筋,而韩国队却有多名队员相继抽筋,如果不是裁判原因我们完全能赢对方。但自那以后,我们就认定自己不行,为什么?没有信心。所以,中国的足球关键还是在于树立自信心。

二、流派与风格的误区

谈足球,总要涉及球队的某种打法、风格或是流派。乍一看,打法、风格和流派这三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譬如巴西队,是南美技术派代表,我们习惯称他们踢的球是“桑巴足球”,其风格就是队员讲究技术,讲究两三人之间的配合,在具体打法上投入的进攻兵力较多,攻势如潮,让人看了赏心悦目。然而,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而我国足球运动徘徊不前,很重要一点就是过分拘泥于追求风格与流派。

人们总愿将世界足坛分成欧洲力量派、南美技术派、拉丁派等几大流派,并认为现代足球运动正朝着大融合方向发展,等等。实际上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本身就没有搞清足球运动的本质。

足球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攻与守的问题。一支球队要想取得好成绩,必须首先解决好攻与守的矛盾,只有掌握了球场上的攻守客观规律,才能有所建树。以 1994 年世界杯赛上的巴西队为例,之所以最终夺冠,最关键的就是解决了攻守这对矛盾,使得攻守平衡。而过去 20 多年中,屡屡失败,症结在于攻守不平衡,攻强于守,虽以拉萨罗尼为代表的教练对巴西足球进行了变革,但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所以,意大利世界杯赛上仍以失利而告终。佩雷拉上任后,顶住各界压力,继续进行改革,在保持过去强大攻击力的同时,更注重防守,最终获得了成功。也就是说,巴西队在打法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才有了今日成绩。

但是,1994 年世界杯赛上夺冠的巴西队在风格上,与 1982 年、1986 年杯赛上由“艺术大师”桑塔纳指挥的巴西队相比,已有了本质的区别,人们再也见不到当年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等率

领下的“艺术足球”了，那种水银泻地般的进攻场面不见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进我一个我非进你两个”的势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首先不丢球、不丢分。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巴西队仍是南美技术派的代表，队员的脚下功夫，仍然是欧洲球员所无法比拟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打法、风格、流派这三者间的区别。三者间虽有其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内在的必然联系。例如，我们常说英格兰和德国是欧洲力量派的典型代表，但英格兰有英格兰的风格，德国有德国的风格；泰勒执教的英格兰队在打法上又与罗布森、维纳布尔斯执教的英格兰队全然不同，福格茨和贝肯鲍尔执教的两支国家队在打法上也有很大区别。所以，我们应把这三者严格区别开来，流派是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的，而打法却是具体的客观存在，攻与守则是足球运动中的客观规律。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将这三者混为一谈，混淆三者各自的概念。这其中有舆论导向的问题，也有我们不少认识上的问题。

以世界杯赛为例。当欧洲球队一一击败了拉丁美洲的球队，有些人便认为是欧洲足球占据了上风，是南美技术派和拉丁派足球的失败。可在巴西、阿根廷相继获胜之后，有人称是南美技术派足球的胜利。

如果足球比赛真是那么简单，仅仅是某种流派战胜另一种流派，那还要那么多技战术打法干什么？

再看国内足坛，我们常常以长江为界，把长江以北的球队统称为北派，以南的球队统称为南派；如果是辽宁队击败了广东队，便说是北派战胜了南派，反之则称是南派战胜了北派；把苏永舜、岳永荣等教练统称之为南派代表，把李应发、高丰文等教练称为北派教练。人为地把他们隔裂开来，似乎只有南派才讲究技术，北派就只讲力量，不要技术。

流派划分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划分是很模糊的，也是粗

略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它所反映的是某一地理位置概念、地域概念,反映地理位置相近国家的政治、文化、民族等特点,是属于足球文化范畴内的东西。人们从欣赏角度去看足球,完全可以这么划分。但是,流派并不反映足球场上的攻防本质及基本规律。

国人爱看京剧的不少,也都知道其中有许多流派。有人喜欢谭派,有人喜欢马派,有人喜欢裘派……而喜欢某一派的戏迷又可具体归结到这一派中的具体某个人身上。这与足球中有球迷喜欢欧洲力量派,有球迷喜欢南美技术派,喜欢南美技术派的球迷中有人好巴西队、也有人好阿根廷队是一个道理。但是,看戏是一回事,唱戏是另一回事,并不要求非得分出个高低、胜负;而看球只是图个热闹,踢球则是必须分出胜负的。靠什么来决定胜负?靠球场上的攻防,谁掌握了攻守规律,谁就是胜者,所以,攻防原则与足球流派没有任何关系。故此,流派的产生,纯粹是为了满足球迷们观赏的需要。那些在足坛站稳脚跟的优秀球员,靠的是出色的脚上功夫;而国内球员技术不精,抢点意识又不强,所以“长传冲吊”显得不伦不类。这就是我们的长传反击与英式打法本质上的区别,“形”似而“神”不似。

与“风格、流派与打法”之说相类似的,还有自甲 A 联赛以来流行的所谓“抢逼围打法”、“抢逼围战术”、“压逼式打法”等等,究竟什么是“抢逼围”?它究竟是一种打法、一种战术,还是仅仅是一种服务于战术本身的手段?

看世界杯赛或欧洲锦标赛,有哪支球队不抢、不逼、不围?“抢、逼、围”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是为更好地进行防守、或是更好进行进攻。显然,“抢逼围”仅仅是一种手段,因为没有“抢逼围”,足球照样踢,只不过踢得不好看而已。

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但是,究竟是学打法、风格还是流派,必须首先弄清楚。我们应该走出所谓风格、流派的陷阱,把流派这一概念抛开,从足球运动最本质的东西

着手,而不应盲从某种打法、某种风格,因为打法、风格是属于本性的东西,自己既不会丢,别人也学不会。而当我们对照中国足球实际,学习他人之长,也许便不会再过多拘泥于别人的风格、流派了。否则,中国足球的弯路还得走下去。

足球不是“圆”的。

中国的足球更不是“圆”的。

中国足球需要理性。

第二节 中国足球需要理性

中国足球不仅在足球场上需要理性,在职业化这个问题上,似乎也需要理性。

我们为什么要搞职业化?难道职业化真的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连基本生活都有问题,更谈不上职业化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这几年足球水平提高迅猛?

美国在 1996 年之前连本国的正式室外足球联赛都没有,为什么能在 1990、1994 年连续闯入世界杯决赛圈?

亚洲的伊朗、阿联酋至今也没有本国的职业联赛,仍属于业余性质,为什么伊朗队能以 3 比 0 胜沙特队、6 比 2 狂胜韩国队?阿联酋队也能获亚洲杯赛亚军?而开展了职业联赛已 3 年的中国队为什么连亚洲杯赛上小组出线都要叙利亚人“帮忙”?

中国足球的问题难道真的是体制的问题?

为什么同样是专业体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屡屡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赛上取得不错的成绩?而我们至今连世界杯赛是什么样的都未曾见识过?

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与前东欧的国家不搞职业

联赛,成绩不错,而在走上职业化道路之后,成绩反而下降?例如,俄罗斯队就是一个典型。

为什么现在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依然未实行职业化,但一旦参加亚洲地区的比赛,仍是亚洲诸强谁都不敢小视的强队?

为什么中国足球在走向职业化之后,成绩不但没有上去,反而给人以退步的感觉?

为什么中国足球在实行职业化之后,过去原有的问题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反而在职业化之后新的问题越来越多?最典型的,就是以苏永舜为代表的国内老教练员均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的运动员钱多了,腰包鼓起来了,但吃苦精神太差了,无论是训练还是自我约束能力,根本无法与80年代初时所带的那些运动员相比。他们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呼吁“不要宠坏了我们的绿茵‘骄子’!”无独有偶,多位在中国执教过的外籍教练在离开中国时,均作出了这样的忠告:如果中国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素质不提高,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

难道这仅仅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吗?

现在,我们走上了职业化道路,那么,究竟什么是职业化?职业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面对即将来临的世界杯预选赛,一旦中国队冲击失利,是否意味着中国足球改革的失败?

.....

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是否曾经思考过?

我们可以借助舆论新闻媒体的力量,把足球“炒”热,可以让球迷重新回到看台上去看我们的“职业联赛”。但是,光靠“炒”,能把上述问题的答案“炒”出来吗?

还有,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在中国足坛粉墨登场,3年多了,我们有哪些收获与值得肯定的方面?职业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思维与新气象?又有哪些经验和教训需要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继续发扬与汲取?这些也能“炒”出来吗?

中国足球需要理性。本书正是以此为宗旨,结合欧美职业足球的情况,对中国足球这3年多来的职业化进程进行反思、总结。

第三节 中国职业足球发展史

尽管具有“职业”色彩的联赛在1994年才开始,但是,应该说中国足球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出现了职业化的萌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之中。尤其是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在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之后,已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物质上的享受,开始追求文化、精神生活上的“富裕”,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大手笔”。1982年底,我国“足球城”大连市的甘井子区大辛寨青年农民任全福自己出资,举办了“迎春杯”足球赛,开创了社会出资举办足球赛的先河。这是我国足球职业化的先兆与萌芽。据统计,至1984年,全国仅在这一年内由社会出资举办的这种性质的足球赛就超过了20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年底在广州进行的有中国队参加的第八届亚洲杯赛第四小组预选赛;由湖北省承办的首届足协杯赛(全国24支球队参加);由上海、广州和天津共同承办的第8届长城杯国际足球赛;由大连、沈阳承办的中国TDK杯国际青年足球赛;广州白云杯国际足球赛;等等。这种形式有效地解决了因国家体育经费有限而造成的主办足球赛经费紧张的问题,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984年10月,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出资18万元人民币赞助广州足球队,这是企业首次出资赞助优秀足球队,使中国足坛出现了由企业出资赞助、厂队挂钩合办足球队的全新形式,为以后正式走上职业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纵观这 10 年来的发展,中国足球在职业化进程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企业出资赞助阶段

这一阶段以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出资赞助广州足球队为起点,至 1987 年辽宁“东药模式”出现以前。

足球队接受赞助费之后,由于经费上有保证,可以利用经济杠杆,制订相应的奖惩规定,使球员训练的出勤率有提高,队伍较之以前好管理了。同时,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也有增强。但是,球队因完全靠金钱解决问题,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球员受当时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影响,对奖金数额不知足,导致训练中出勤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老队员,摆老资格,自认是比赛中的主力,比赛是靠他们打的,所以训练时不如年轻队员和非主力队员认真、积极,单凭训练中的表现发放奖金,老队员感到吃亏了。而且,足球队内部因一线队员有赞助,二、三线队伍没有赞助,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少。球队成绩的好坏与教练员的利益又没有挂钩,二、三线担负输送任务,但干部、教练却没有奖金,送多送少一个样,挫伤了基层教练的积极性。如果同一省市的一、二队分别由不同厂方提供赞助,互不买帐、互不支持,彼此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二)官办民助阶段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辽宁东药俱乐部”的成立。球队接受赞助后出现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为了解决球员在训练中出工不出力、奖罚措施不得力的状况,急需一种新的管理形式来真正调动球员的积极性,避免各种可能出现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体委与厂家共同出资,成立了联合性质的俱乐部,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仅有厂家一方投入。

这是一种已初步具备半职业性质的俱乐部形式,较过去的专业体制有一定的进步性。最具代表性的首推“辽宁东药俱乐部”,